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春秋史笔】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上）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秦 晖
【史海钩沉】	一个不停游荡的幽灵——试论血统论对清华文革的影响	张 比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春秋史笔】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上）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 秦 晖 •

一，关于“气贯长虹”的领袖讲话

这篇关于文革的文章要从文革前的一件事谈起。

1957年，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惊人言论，在各共产主义“兄弟党”中引起强烈反应，后来更成为中苏分裂的由头之一。根据中方后来整理的文本，毛泽东是这样说的〔1〕：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个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直到现在，在我国的一些“主旋律”论著里，这番话仍然得到高度评价，被赞为“一篇气贯长虹。洋洋洒洒的讲话”〔2〕。就连以敢言真相著称的当代史家沈志华先生，也为这番话做过辩护。他先是考证了当时苏联方面的会议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是〔3〕：

“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将得到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

“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

沈志华据此分析说，双方发表的文本主要是后半段话（指中国可以先打仗再建设）有些区别，前半段是大致一样的。值得提到的是，沈志华还从中国的档案中找到了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再次就这个问题的讲话，毛泽东这次说的是〔4〕：

“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1 0 0 0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3 0 0 0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 7亿人，还有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这里没有涉及“后半段”，但显然毛泽东主要强调的就是这前半段，而且正如沈志华指出，他这次“说得更加透彻”——在苏联他假设核大战会使人类死去一半，在国内他更说是会死三分之二，但这能换来理想的实现，所以“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具体地讲，死掉一半是“最好”，死掉三分之二是“次好”，当然，如果这能够“换来帝国主义灭亡”的话。

做过上述考证后，沈志华分析道，赫鲁晓夫对这段话如此反感似乎没有道理，因为他自己也讲过类似的话：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 1月1 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记者夏皮罗的谈话记录。其中记者问道：“您是否认为在爆发原子战争和氢战争的情况下这个世界还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赫鲁晓夫答：“当然。会有非常惨重的损失，人类将会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掉，社会将会生存下去，并且得到发展。”沈志华说，赫鲁晓夫在毛之前4天的此番讲话“与毛泽东讲话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样的”〔5〕。

但读过这些文字后笔者很不解：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人讲话的“主旨是完全一样的”吗？如果仅就“核战不会消灭人类”这个事实判断而言，似乎两人说的确实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就这种事情的可怕程度，就它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一价值判断而言，两人岂止不一样，而且简直是对立的。甚至就毛泽东自己而言，同样的事实判断换一种讲法，也会有天壤之别。

证明这一点其实并不困难，我们只要把毛泽东的原话改几个字，甚至只改一个词，试试看同样的“道理”能否用于他自己，以及这种“道理”别人能否讲得出口：“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最好炸死了毛泽东，剩下刘少奇，次好刘少奇也死了，剩下邓小平，有邓小平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这番话事实判断完全相同，只是换了几个词，与毛泽东的原话在逻辑上与句式上完全一样。为毛泽东原话辩护的一切理由也完全可以拿来为这句话辩护。

但是笔者要问：在当时的中国，有谁敢这样讲吗？如果有，可以肯定他立即会被“专政机关”宣布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要告诉我说毛泽东不知道），绝不可能活得下来！如果有人当时把这样的言论评价为“气贯长虹，洋洋洒洒”，像现在他评论毛泽东的原话一样，他也肯定难逃作为“反革命”被枪毙的命运。

我们还可以设想，在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再疯狂的反共“疯子”胆敢公然讲出这样的话吗：“要准备对付大战，共产国家有疯子，扔原子弹。……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有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共产国家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这番话甚至只换了一个词。

但是，无论多么疯狂的反共“疯子”，哪怕面对的也是反共的听众，若是在纳粹体制下倒难说，在民主国家里他敢讲这样的话吗？可以肯定，在民主国家里即便是反共的听众听了这种话，也不会认为他只是“共产国家”的敌人，而是会认为他是人类的敌人，首先就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他如果讲了这种话，肉体生命会如何不敢说，政治生命肯定就完了。在民主国家谁敢拿几千万、更不用说18亿人命去做赌注来实现领袖的“伟大理想”？

显然，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核战争后人类究竟可不可能幸存，不在于“两个选择”（战争或和平）还是“一个选择”（只有和平），甚至也不在于核战争的责任属谁。而就在于基本的价值观：是领袖为重，9亿乃至18亿人命都如同蝼蚁，还是亿万人命为重，领袖不能一“浪漫”起来就拿他们当“代价”去换取“理想”的实现？

因此笔者不能同意沈志华的这个判断：赫鲁晓夫对夏皮罗的谈话“与毛泽东讲话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怎么可能一样呢？你固然可以说两人都认为核战争后还会有人幸存，但是两人谈话的“主旨”根本不在此，而在于：那些未能幸存的是什么人？对他们的不幸应持何种态度——因而在核战和维护和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持何种立场？

很明显，毛泽东认为那些未能幸存的9亿乃至18亿蝼蚁是不包括他毛泽东自己的，他自己则很有信心能够幸存并领导余下的9亿人成就“打平帝国主义”、“全世界社会主义化”的万世伟业，因此18亿蝼蚁的死亡当然就不过是小小的“代价”，“不见得是坏事”，甚至还是“次好”了。而赫鲁晓夫尽管也是独裁者，他的“非斯大林化”很不到位，因而也做过一些不人道的事，但是他的人道情怀和人类意识仍然不是毛泽东所能望尘的。赫鲁晓夫并非不知道，如果以倾国之力加强他的个人防护，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核大战中幸存，但是他不是毛泽东，他仍然不能对亿万人民的死亡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才能毅然妥协，与肯尼迪一起使人类免于一场核战浩劫。我们知道，当时毛泽东对此是非常不满的，他强烈谴责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尽管谁都知道赫鲁晓夫不仅谈不上“投降”，而且在赫鲁晓夫及其后任执政的整个1960年代，苏联在冷战中都对美国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这一点并没有因古巴危机的小挫而改变。但攻势归攻势，赫鲁晓夫不能拿亿万人民的生命去与美国豪赌。对此，我们只能庆幸当时苏联在位的不是毛泽东。

二，由行为推断动机，还是由“动机”剪裁“行为”：关于动机推断的逻辑预设

几年后毛泽东同样以这种“气贯长虹”之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文革至今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思想史研究。从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到关于消灭社会分工、城乡差别的“五七道路”乌托邦，从“巴黎公社式民主”到培养接班人的若干“标准”。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动因，乃至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人们已经分析得淋漓尽致。今天如果有人说，文革就是暴君毛泽东为个人权势欲而翻云覆雨无底线弄权导致的灾难，他多半就会面临如潮的否定：不仅“左派”肯定会认为他“妖魔化”毛泽东，违背了神圣的“政治正确”，“右派”也会认为他无视意识形态与“深层文化”的问题而只归咎个人意志，眼光实在肤浅。于是，拥毛者固然极力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高尚而美好的道德理想，反毛者也有些“深刻”的人反过来对“道德理想国”表现出排斥乃至恐惧，甚至归纳出“最大的罪恶来源于最崇高的理想”的规律，号召大家都别太追求高尚，乃至提倡归于庸俗和犬儒，似乎只要人们从此变“向前看”为“向钱看”，就会永保天下太平了。

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高尚动机”？这却是一个“思想史研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思想史的实证依据充其量也只能是领袖说出来的或写出来的东西，即便他言之凿凿说这就是动机，但谁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能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其实，从张春桥文革中搞的“巴黎公社式的”“上海公社”被毛叫停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连他最亲信的近臣张春桥都未必能一定猜对主上的心思〔6〕，更不用说没有真正交往过他的研究者了。真正的“动机”作为头脑中的想法从根本上是无法实证的。事实上，今天即便是对档案及第一手资料掌握最多、研究的实证性最强的当代史前沿学者，其海量的引证也只能就历史过程本身论真伪，而无法就行为“动机”论真伪。这些研究真正谈到动机时也只能从作为事实的前因后果出发，用逻辑推理来揣测事主的心路，或排除他人揣测出来的别一心路。

不过，这种揣测无论证实还是证伪，其实都依赖于某些先有的假定，因而在逻辑上很难严谨。例如，很多人反对那种毛泽东搞文革仅仅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的说法，其常用的反证法就是：以毛当时的地位，他如果只是要清除刘少奇或其他高层政敌（包括假想的政敌），完全可以使用组织手段乃至警察手段，像斯大林的党内清洗、或者像文革前搞掉高岗、彭德怀那样，而根本不必采用发动群众“造反”、把整个官僚机器冲击得七零八落这样一种奇特而冒险的方式。

这种反证有道理吗？或许有，但逻辑似乎并不严密。其实，笔者还可以用另一个“如果”来补充推理，使逻辑更严密些：假如毛不是面对高层政敌，而只是要清除知识界或民间的异己势力（含假想的异己，如当年的“右派”书生或农村中的“单干”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等等），他也完全可以使用当年“反右”的方式，即依靠官僚机器整治“不臣”之民。而不会反过来号召民众向官僚“造反”。

确实，有了这对上和对下的两个推理，逻辑上似乎就可以说，不管领袖是要整上边还是要整下边，文革都不必要。这也就是历史上一般的暴君都没有玩过这种游戏的原因：如果毛泽东要整政要，他可以搞常规党内整肃；如果毛泽东要整民间，他可以依靠官僚“反右”——刘少奇当初不就是这么揣测圣心的吗？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没有必要为固位擅权而煽动群众“造反”。所以，毛泽东居然这样做了，那显然只能是出于“理想”动机，出于他（左派欣赏的）“爱民”或（右派反感的）“民粹”立场与反官僚（或反精英）的平等主义（或反智主义）思想，等等。

但这样的双重推理就算严谨了吗？我们不妨从事实来反推一下：在那十年文革中〔7〕，毛泽东难道仅仅是支持民众“造反”整官僚，就没有支持乃至组织过官僚整民众、支持过“老保”镇压造反？其实这类事例之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可以信手拈来！可笑的是，过去不少人从根据行为（其实只是部分行为）推断动机，发展到根据“动机”圈定、选择和剪裁“行为”，循环论证，倒果为因，对浩如烟海的后一类事实视而不见，生生把文革描绘成了造反派的“十年狂欢”和似乎仅仅对当权者而言的“十年浩劫”。

其实，不要说1968年以“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号令对造反派进行规模空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及从次年起“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一波又一波矛头向下、主要是清算造反派的运动，也不要说1966年贵族子弟残害“贱民”、红色衙内打死红色保姆的恐怖“红八月”中毛泽东公然鼓励贵族子弟“要武嘛”。仅就“造反派”所怨恨的那个“五十多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言，刘少奇在毛泽东避居江南的情况下揣摩圣意，把文革理解为又一次“反右”，派工作组到学校抓“反动学生”、大肆“镇压群众”。无论他是揣摩错了，还是圣意本来就想给他下套，那矛头向下的“反右”模式总是毛泽东在1957年搞得淋漓尽致的吧？难道毛泽东那时是“官粹主义”者，1966年却突然变成了“民粹主义者”？刘少奇1966年从外面派几百个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运动”是镇压群众，毛泽东1968年派三万人“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一切”为什么就不是？1966年10月毛泽东曾大骂走资派“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8〕，一年多以后他自己把这一手玩的更厉害。刘少奇1966年的“反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1957年这样搞为什么就不是？无论把那种事褒称为“反右”还是贬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两个人做了同一类事，只是一个在1957年做，一个在1966年做（其实在1957年也帮着做过，否则也不会如此揣摩），那么这两人你死我活的斗争与思想或“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

其实，人们不是没有谈论过那十年中毛泽东依靠官僚整百姓、整造反派的事例，只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些事例有“思想史”意义。他们或者说：都怪造反派不听话，辜负了领袖的厚爱，使得领袖不能不“挥泪斩马谡”。或者说：那是因为官僚集团施加了压力，领袖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委屈了造反派。所以这些事实都不妨碍他们断言“思想史上的”毛泽东仍是反官僚的“民粹主义”理想家。

但是，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毛泽东发动百姓整官僚为什么就会有“思想史”意义呢？为什么不是这些官僚不听话，辜负了领袖的厚爱？或者因为群众施加了太大的压力，领袖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像过去皇帝那样出台“让步政策”，委屈官僚做替罪羊？为什么这些事实就会妨碍他们断言“思想史上的毛泽东”仍是个反民众的“官粹主义”厚黑家？

现在我们来推敲一下逻辑：如前所述，“如果毛泽东要整政要，他可以搞常规党内整肃；如果毛泽东要整民间，他可以依靠官僚反右”，但作为推理的预设，为什么“如果”仅限于以上两种？如果毛泽东面临第三种情况，或者是以上两种“如果”的重叠，即他既感到来自政要的威胁，也感到来自民间的威胁，那么单纯的斯大林式整肃或单纯的“反右”还用吗？

不难证明在1962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确觉得两种威胁同时存在。一方面，四清、社教中他就多次说官僚群中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矛头向下”的狠话他也讲了很多，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打倒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尤其是农村更有“单干风”，“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9〕。早在农民刚刚摆脱饿死威胁的1962年，毛泽东居然就对“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耿耿于怀，“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在党内信息渠道、包括他身边的私人渠道都告诉他农民普遍欢迎包产到户的情况下，他却明确表示“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要打击“富裕农民阶层搞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10〕。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心血来潮“重上井冈山”，途中对张平化等人大讲“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认为这是生死攸

关的问题，却对当权派和“身边的赫鲁晓夫”未置一词。研究者把此行视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前奏”（11）。显然，这是一个“矛头向下”的前奏。

有趣的是，当1966年末毛泽东在庆生宴上为“全面内战”而干杯、各地群众性“造反”达到高潮并导致不久后的“夺权”斗争时，各地的“造反”群众确实有大量对过去“极左”做法、尤其是三年“人祸”不满的人，特别是当时党内最早“站出来”支持造反、并得到中央文革肯定而名扬全国的一批地方干部，如黑龙江的潘复生、山东的王效禹、安徽的张恺帆、程明远等，这些人当初多有因“右倾”、尤其是农村问题上的右倾而被整的经历，对比一下上述的“前奏”，他们本来不就是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来清除的人吗？中央文革怎么会支持他们“造反”呢？而他们后来很快又被打翻在地，这是因为他们“不听话”？还是当初让他们造反本来就是“引蛇出洞”？

总之，当毛泽东感到同时面临分别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威胁（这里先不讨论这些威胁客观上是否确实存在）时，他能放心依靠刘少奇这类官僚来“反右”？他能相信只用警察手段除掉刘少奇们就可以消灭“要搞包产到户”的“群众”？……考虑到毛泽东的阅读史和政坛经历，不难想到他会怎么做：与其让这两方面的可疑分子将来可能联合起来咬我，不如现在设计让他们互咬。居高临下煽动和操控政要和民间互斗，一会儿鼓动民间冲击政要，一会儿支持政要镇压民间，翻云覆雨之下既从“酷吏”的手里解放了“冤民”，又从“暴民”的威胁下解脱了“怨吏”。两头的异己都被铲除，而自己在两头都可以恢复“大救星”的地位（12）——这样的“智慧”在毛熟读的古书（尤其是他最欣赏的法家厚黑学之书）中找不到吗？没有“平等主义”思想就想不出这种招数？

三，七·二七事件：“造反派，真的反了”？

我们不妨看看文革中的关键事件之一：1968年7月27日，三万名工人、解放军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大学，要把当时正在“武斗”的全校两派一千名左右的学生赶出学校并对清华实行强制占领。校内处于优势的“团派”头头蒯大富等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再三联系无果。蒯认为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决定遇到进攻即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等狼狈逃出，毛泽东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北京高校造反派从此土崩瓦解。毛泽东派出的“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关于此事，过去的官方叙事完全归罪于蒯大富。说工宣队进占清华这件大事事先是正式通知了蒯大富的，据说蒯大富当时满口答应一定配合。然而放他回清华后，他却马上变卦，下令清华井冈山武力对抗工宣队，结果造成了流血事件（13）。但蒯历来否认此说，他多次表示，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负责人谢富治等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14）？

而毛泽东昔日心腹近臣谢静宜近年发表的回忆可以说是证实了蒯大富的说法（尽管她的本意是要护毛骂蒯）。谢静宜说：毛泽东在7月24日就决定“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进入大学，“捅它这个马蜂窝。”据说，毛泽东这时“像指挥打仗那样精

神振奋，语言激昂”。而且毛当时就指出：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谢静宜回忆说她当时就“惊呆了，脱口问道：‘这是真的啊？’”（15）

谢说：毛泽东在做出“捅马蜂窝”决定后，首要的考虑就是对清华两派人士乃至一切与清华沾边的人严密封锁消息，而且做得滴水不漏。毛泽东亲自交代，参加行动的工人必须来自“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毛泽东不但要瞒住蒯大富和他那一派，也瞒住了包括对立派在内的所有“清华人”，还要瞒住包括北大在内的各“大学”。“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毛泽东不仅布置了严格的保密，而且让北京当局以疑兵之计迷惑“清华的人”：（行动前）“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这样就给人以并非要采取强制手段进占清华的假象，同时完成了大规模人力部署。27日当天，“指挥小组一声号令”，三万多工人、农民、军人分成8个团，“浩浩荡荡向清华大学进发。到后，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他们一下”。直到10点钟准时，8个团“按事先的分工，同时从各大门一齐进校，到达各分工地段”，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捅马蜂窝”的突袭占领行动。

显然，根据谢静宜的回忆，工宣队进占清华的决定不仅没有事先告知蒯大富，而且处心积虑地就是“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不仅不通知，还严格保密。不仅严格保密，还一直采取种种疑兵之计“麻痹”清华人直到最后一刻，就是要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毛泽东在24日就指出：“捅马蜂窝……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那么他这样的布置是为了避免流血吗？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他真的希望“和平解放”清华，只要告知他已派出大军压境，清华人要知趣。那么“清华的人”如果是敌则没有对抗能力，如果是拥毛者更不可能有对抗意志，只要他们知道三万大军来自毛泽东，流血对抗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事先通知清华不仅是避免流血的“充要条件”，也是极易实现的条件。蒯大富作为他一手扶植的嫡系“小将”，过去一直与“文革首长”保持有直接的联系通道，作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也一直与市革委主任谢富治保持工作联系，无论通过中央文革还是通过北京市革委，与他沟通完全是自然之事。

但是按谢静宜的描述，毛泽东恰恰就是要刻意消除这个条件！其他资料也证明了她的回忆。如清华原住有一支海军军宣队，那本是早在2月13日就奉命进清华宣传制止派斗的，在校两个多月与两派都混得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却于25日奉命撤出清华，听任两派大打。他们撤出后并未解散，而是集中驻于宣武区待命，并一直与校内两派人员有联系，明显是准备再入清华的。可是，七·二七当天的行动却对他们保密。把这些先前已经进校做过不少工作、熟悉情况、清华两派也都认识的人撂在一边，却另派三万陌生人闯关而入。这样决策究竟是为了什么？无怪乎采访者惊呼：“啊……，简直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45年后，我才知道，太难以置信了。”（16）

聂元梓后来说：“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17）蒯大富和当时与他对立的另一派头头孙怒涛也都认为，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会发生惨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不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封锁消息。显然，这些愚忠于毛的造反派太不了解毛了！

不但如此，按谢的回忆，“宣传队”进清华后，七·二七行动总指挥部曾决定“限工农宣传队只准走的路线，以及规定哪些路线、地区不能进、不能通过”。这本是保障有秩序地“和平解放”清华所必须的规则。但毛泽东知道后却大为光火，他“气愤地说：‘大学是工

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办的。什么这条路能走，那条路不准通行？是谁规定的？没有道理。对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来讲，条条道路都是（可以）通行的。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这）是犯了‘路线错误’。”（18）于是，毛泽东亲自下令取消了对“宣传队”进清华后一切行动的任何空间限制，而不容任何商谈。显然，毛明显是要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事态、人为增加三万大军与千余学生发生冲突的机率。

而另一方面，他又布置三万人进占校园时都不带枪。要知道这突袭清华的三万“宣传队”虽然没带枪，更没放枪，但他们绝非仅仅是来“宣传”的——事实上，毛泽东授意的疑兵之计也正是要让“清华的人”相信那些人仅仅是“宣传队”，而非“占领军”。因此毫不奇怪，当那些人突然从宣传队变成占领军，却又没有枪这个有效威胁和防护手段时，就如光着膀子“捅马蜂窝”，只能增加他们被“马蜂”狂蜇的机率。蜇死了人的“马蜂”难辞其咎，如此策划的人又该负什么责任？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陈长江曾回忆，毛听周恩来报告说清华发生流血死亡后脱口而出曰：“造反派，真的反了？！”唐少杰先生认为这与谢静宜的回忆有所不同。其实现在看来，毛如果真讲了那句话，恐怕也不会是意外惊讶，而是计谋成功后的惊喜语气。正如唐少杰另一处评论的：“这再次印证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语：‘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19）

至今有些人还说：蒯大富发动武斗，有罪在先，凭什么工宣队进来要先通知他？这种说法显然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蒯大富有罪是一回事，为防止工宣队伤亡需要事先通知是另一回事。后一件事不是要为蒯减罪，而是要维护工宣队员的安全。哪怕此前蒯已是罪不容诛，毛泽东直接下令军警抓他归案也就罢了，为什么要用这种“引蛇出洞的阳谋”搭上几个工宣队员的生命呢？

现在我们知道，“造反派真的反了”确实不该用惊讶语气，因为至少在毛泽东布置行动的七·二四当天，“中央”已经视蒯大富为敌人。当时主要的口实是：7月18日在北航，各省造反派开了个“黑会”，据说他们要成立全国性组织与中央对抗。而蒯大富就被定为这些“真的反了”的造反派的“黑司令”。就在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团”时，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们一齐厉声斥责广西四·二二造反派，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严厉追查所谓的“黑会”，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广西人被严令交代“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首长们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20）。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

而在七·二八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也大谈了镇压广西四·二二的事和北京造反派与各地造反派密谋“开会”的问题。林彪甚至耸人听闻地说：“我们还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毛泽东、周恩来都提到北京高校窝藏已经被他们说成是“土匪”的广西造反派。康生则断言：“他们（指蒯大富等人）想控制全国运动。”（21）按这样的口气，蒯大富这些人真是要密谋联合各省造反派反抗中央，“造反派真的反了”！

但有趣的是，近年来无论广东、广西还是贵州的“黑会”与会者的回忆，不管细节上有多少出入，都有个共同点：“黑会”一开始被当局看得非常严重，致使他们会后几乎立即失去自由并被反复逼供。但是自七·二八召见后，对“黑会”的追查却奇怪地不了了之，很快就不再被提起。甚至包括蒯大富在内的与会者后来被惩罚时，所开列的罪状中都没有再提

“黑会”的事。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他们几乎忘了此事，近年来清华人关于七·二七的诸多回忆录中均未提及。今天再忆，不少人对此还迷惑不解。

笔者的解释是：当初这个会本来没什么大不了。在1968年那个血腥之夏，各省都发生了对造反派的镇压（22）（广西等地甚至发展成大屠杀），各地造反派流亡北京的难民与上访者（包括中央承认的代表团与自行流入北京者）成千上万。当时广东“旗派”头头武传斌想与各地“战友”开个会交流情况，探寻向中央求助的途径，遂找到韩爱晶，借北航之地开了那个会。但韩本人避不与会，蒯大富到会露了个面讲了些欢迎之类的话就走了。会上据说有辽宁的人提出过是否要搞个全国组织或联络站，但这并非会议的原定议题，（多数回忆者甚至否认听到过这个意见）也没人响应，很快就被否定。显然，在文革时期“群众组织”活跃的状态下这个会本身并不特别出格，而且也主要是武传斌之类外地造反派在张罗，北京造反派只是应付情面，蒯大富本人与“黑会”的关系甚至比作为东道主的北航人更少（23）。但这就被“中央”抓住了把柄——为了整北京那几大造反派“领袖”总得找个事嘛。

但是，到了七·二七那天，团派对抗打死了工宣队的人，引起公愤，毛泽东的意图已经达到，整他们的理由已经有了。而且事实上几大领袖也已经垮了，也就用不着再找那个其实中央明知道没什么油水的理由了。

其实，强制“收官”、搞掉造反派当时已成为毛泽东的大主意，“黑会”不过是提供了个口实，没有这个口实，毛泽东也会下手。以他的“神机妙算”，可以在下手中再找口实。果然，清华团派打死工宣队成了更好的口实，“黑会”也就可有可无了。否则是没法解释后来这个“案件”何以被放过的。我们知道，整个文革中有过多少无中生有的冤假错案，相反地，由于“为尊者讳，投鼠忌器”而化有为无的“虚无”做法也是不胜枚举。却就是没有一件并非为尊者讳、而是把本来就要整肃的人确实犯过的事给隐藏起来予以庇护的例子。蒯大富等后来都是长期坐了牢的，“黑会”也没有涉及什么需要投鼠忌器的尊者——当时中央所有头头脑脑之间无论有什么矛盾，在对待这件事上都是完全一致，不应该有什么可顾忌，但为什么后来就是不提这件事了呢？现在看来谜底已经清楚了：蒯大富们当初即使不抵抗，清华园也未流血，他们的下场也未必会更好（就像没有抵抗的韩爱晶等人的下场一样），因为已经有一个“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和中央对抗”的罪名在等着他们了。这个罪名后来不再提，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更为合适的罪名——打死了“宣传停止武斗”的工人。如果没有这个罪名，清查“黑会”的动作恐怕是不会无疾而终的。显然，从毛泽东决定“捅马蜂窝”时起，蒯大富们就在劫难逃了。

在七·二八召见时，其他首长都气势汹汹，毛泽东虽然也是严厉训斥，却也对蒯大富流了眼泪，还对左右说了些不要整蒯之类的话。这就使蒯大富感戴至今。其实无论是追查“黑司令部”还是“捅马蜂窝”，没有毛的旨意，各派首长岂能如此一致？笔者曾言：毛泽东拿他亲手扶植的“小将”祭旗不能说没有一丝怜惜，但“政治纸牌屋中毛唱白脸别人唱红脸的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至于蒯虽然当时就失势，但只是放逐到宁夏，两年后才被捕，那也是很自然的。1968年秋学生们都还在校，抓头头不方便，等到学生都被打发星散、各奔东西了再动手，那也是全国一样的，并非对蒯大富特别温情。

四，“牺牲左派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二月镇反”和“负帕累托改变”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宣布搞文革的前后，毛泽东一直在南方各地游走达8个多月，让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揣摩圣意主持运动。刘、邓按十七年政治运动的一贯模式和“宁左勿右”的心理（刘已知在“七千人大会”得罪于毛，一直战战兢兢，四清时就

表现得特别“左”）派工作组到基层去“领导运动”，“在五十多天里”按“反右”的套路狠整知识分子并大抓“反动学生”，积累了民怨。结果毛泽东一回京，就在8月5日“炮打司令部”，说刘、邓搞“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发动人们起来抗争。于是“五十多天里”的民怨带出了“十七年”的民怨，意识形态煽起的“奉旨造反”与有民意基础的“借旨造反”互相激励，形成了“造反派”对各级“当权派”及党政官僚体系的冲击和“当权派”组织“保皇派”对造反的镇压。10月2日，毛泽东安排《人民日报》提前转载《红旗》社论，把刘邓的做法归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号召在全国“彻底批判”之，12月间又连续通过在工业、农村、街道开展运动的决定，最后在12月26日生日宴会上“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24）。这样从10月红旗社论起形成“天下大乱”之势，造反派在各地逐渐得势，而“走资派”（当时已成为除文革中央指名保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以外，全国其余几乎所有“当权派”的总称）及其御用的“老保”逐渐失势，直至发展到源自上海的造反派夺权运动，即所谓“一月革命”。

这期间，10月前造反派在各地并不占优势，而“当权派”支持的“老保”一面压制造反派，一面大肆“破四旧”毁灭文化遗产，同时更大搞针对无权民众、文化人、弱势群体和贱民的“红色恐怖”，并以这种“矛头向下”、无法无天的暴行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保护当权派免遭冲击。直到10月后形势才发生转折，在毛怂恿下逐渐转为优势的造反派形成汹涌大潮，在为毛泽东火中取栗的同时也释放民怨，对当权派和“老保”造成严重冲击，而“狼奶效应”也使他们得意忘形，以“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名义迫害“走资派”与对立派群众（有时也祸及一般群众）的恶行到处发生。

1967年2月起，由于“夺权”后乱局蔓延，毛泽东下令军队以“支左”名义介入权力斗争。而文革前十七年各地“党政军”一体化利益攸关，军队从政后往往镇压造反派，造成“老保”复兴，或者扶植“听话”的温和造反派而镇压“不听话”的激进造反派。同时军队本身也不统一，尤其是野战军与地方军区往往各支一派，致使“全面内战”愈发不可收拾。几度翻覆之后，毛泽东终于以1968年“七三布告”出动军队镇压广西造反派起，到“七·二七”对北京造反派“捅马蜂窝”止，全面转向了对全国造反派的卸磨杀驴（25）。此后全国普遍建立了绝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军人政权”色彩的革命委员会，1969年“九大”后党组织也全面恢复。1968—1971年间，在“后文革秩序”下连续发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等运动，对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进行“秋后算账”，并通过“上山下乡”驱散了一般的城市造反学生。此后各地的一些“造反派”活动，只限于“后文革秩序”下一些原造反派人士的争权与自保，死水微澜，不再成气候了。

然而，造反派的失势并没有终结“常规党内斗争”对当权派造成的伤害。这种文革前已有的政治绞肉机，在“造反派”出现前已经把“彭、陆、罗、杨”等高官卷了进去，在造反派失势后也继续“高效”运转，出现了造反派和“走资派”在监狱里的“大会师”。造反派覆灭后的中国又连续打掉了两个高层“反党集团”以及地方上的各种“分子”，卷入了无数文臣武将。“揪刘英雄”造反派蒯大富垮台后，刘少奇不仅没能重见天日，反而很快在并非“造反派”设立的黑牢中惨死，而他的夫人王光美则被关押入狱直到1978年年底，批斗过“反动学生蒯大富”的王光美与揪斗过“政治扒手王光美”的蒯大富，竟然同时坐牢长达八年之久。

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负帕累托改变”（26）性质至此暴露无遗。在1976年“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中，大批前造反派人士与走资派子弟都参加了反文革的抗议运动。这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至此终于走到了尽头。

文革十年，上述大的翻云覆雨是明摆着的，争议并不大。但是近来，对一些短时段演变开始出现分歧。最典型的是1967年的“二月镇反”，学者在争论：这场明显打击造反派的镇压是否出自“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徐友渔先生认为二月镇反是林彪及中央军委所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并不同意。在他看来，毛泽东尽管翻云覆雨，但“毛泽东给1967年文革运动规定的任务是全面夺权，造反派是夺权的马前卒，1967年2月还远远未到抛弃和牺牲造反派的时候”，“在1967年2月发生的，是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角力……，更大胆也更难以得到确证的，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斗法”（27）。

而何蜀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如同王力所说，‘二月逆流’的火是毛泽东点起来的，实际上，‘二月镇反’的火，也明明白白是由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和所批发的文件、所掌控的宣传舆论导向点起来的。”（28）他举例说，不仅“二月镇反”中军队对造反派下狠手，所依据的很多文件是毛泽东发出的，而且一月夺权后最早的几起把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并予以镇压（甚至出动军队）的事件，就是毛泽东亲自办的。如全国最早一起派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打死27人的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按周恩来的说法就是“主席亲自处理的”，连中央文革想翻案都没能翻过来。而在更早的1月21日，也是毛泽东亲自批示，把吉林延边的造反派组织定为反革命。就是在这个“一·二一”批示的影响下，才有了十几天后中央文革小组把湖南“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的“二·四”批示，而这正是“二月镇反”中的一个典型事例——尽管毛泽东后来又批评中央文革草率行事。

正因为看到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一些受毛泽东保护的老干部和“老师”们才受到鼓舞，在怀仁堂发泄了他们对造反派冲击当权派的强烈不满。他们以为这是在拥护毛泽东搞“党领导下的”文革。不料，毛泽东一面要清理造反派，另一面却还不愿放过“走资派”，于是让老师们碰了个大钉子：“那些老干部们误以为自己是在紧跟毛主席，却领会错了‘圣意’”（29），结果是拥护镇反却被打成“二月逆流”，使毛泽东一度撤销了对他们的保护。

第三种观点来自孙言诚先生，他表示“我赞成何蜀先生的意见，‘二月镇反’是毛泽东部署的。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敢、也不可能发动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镇反运动。”但有趣的是：他在文章中又说：毛泽东“启动‘二月镇反’，却不是针对造反派，相反，他是要用‘二月镇反’来支持造反派夺权”（30）。这是何蜀文章没有的观点，却与徐友渔关于毛当时“给文革运动规定的任务是（支持造反派）全面夺权”很相似。看起来这话非常费解：二月镇反，分明镇压的是造反派——尽管可能只是被认为“不纯”的一部分造反派，但这明明是给造反派的夺权蒙上了阴影，使本已溃不成军的“老保”受到鼓舞，在不少地方死灰复燃，这怎么算是“支持造反派夺权”呢？

其实，只要把孙先生的表述改变一下，就好理解了：毛泽东启动“二月镇反”的确是收拾造反派，却不是支持“老保”，毛泽东当时还是要压制“老保”的。他实际上是“两边打”。而压制“老保”也就可以理解为仍在“支持造反派夺权”——尽管“二月镇反”本身并不体现这种支持。

事实上，这场争论的各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揭示了文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毛泽东不仅在文革的各个阶段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甚至在一个时间段中也是如此：他常常同时使用不同的钓饵，引诱不同的鱼儿上钩。

例如，还在1966年7、8月间毛泽东刚开始“放手发动群众”鼓励造反，并强调“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时，他就在给江青的信中点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31〕。这里说的显然不是正为平息“大乱”而焦头烂额的刘少奇，而是指乘“乱”“跳出来”的造反派。讽刺的是：毛的这个说法与刘少奇派工作组“引蛇出洞”的“新反右”思路如出一辙，只是刘少奇没想到他自己就是毛首先要打的“蛇”。毛先让他整学生积累民怨，继而发动被整者造反把他打倒，再以他为饵引出蒯大富等一大批“牛鬼蛇神”，后来两三年的好戏，都尽在这种算计中了。

到了10至12月间，毛泽东一方面用《红旗》第13期社论给全国范围的造反升温，把当权派们与造反派的矛盾上升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还给周恩来解释说本来想用的措辞是“反革命路线”或“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期间毛泽东还向全国批发了黑龙江省委关于街道文革的规定：运动“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街道居委会的主任不能算作当权派”〔32〕。这实际上形成了按级别划定“走资派”的成例，使得一定级别以上的当权派都成为“走资派”的同义词而遭到造反派的普遍冲击。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在同一时期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对高干们说：“没料到”造反派“搞成那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并要求当权派被斗时“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33〕既向造反派说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又向当权派说他们在造反派面前要绝不低头，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是挑动两者对立吗？这是和稀泥？真和稀泥，就该对造反派说当权派的好话，即所谓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更不要夺权这些话；而对当权派则应该劝他们不要与造反派顶牛，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去较真，反正组织上是了解你们的……。但他却反过来，对当权派说造反派的坏话，鼓励他们与造反派顶牛；而对造反派说当权派的坏话，鼓励他们打倒当权派并且“夺权”。这种两边煽火的做法，无疑严重地激化了矛盾。

1967年初，毛泽东一次接见军队高干时，对二炮司令员李天焕说：“你在打国民党反动派时出过大力，有一份功劳。搞文化大革命你又受了罪，同样有一份功劳。大家不要以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没那么回事。大家不要害怕到群众中去，顶多就是戴高帽子而已。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武器，经过反复较量，好人坏人就会清楚。”原来李天焕在文革中的所谓功劳，就是用自己挨批斗引出“坏人”。当时同样受过批斗的邱会作听到如此高论后想：“（毛）不惜用苦肉计识别干部”，“我心里难过极了”〔34〕。果然半年后毛泽东就对邱会作说：“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了吗？还造你的反吗？文化大革命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跑出来表演。”“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35〕

孙言诚先生就此总结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和他1957年整风是一个思路：一方面发动群众整当权派；另一方面又通过运动“暴露”造反派中的“坏人”。刘、邓正是了解毛的这个思路，才敢于放手抓游鱼、反右派的，只不过他们没想到，毛还要先让造反群众清理他们〔36〕。可怜的造反派被镇压时含泪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们怎么会想到毛泽东正冷眼看着他们。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来访的卡博和巴卢库说：“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37〕聂元梓、蒯大富都靠不住，其他造反派更可想而知。这还是一月夺权的高潮时，通常认为是造反派最受宠的时候，毛泽东却已经在打算他们“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了！

1967年1月28日谭震林给毛泽东并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表达对农口造反派的强烈反感。两天后毛泽东高度肯定了谭震林报告，他说：“党、政、军、民、学、工厂、农

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38〕谭震林这个报告正是为“一月夺权”后对造反派卸磨杀驴的“二月镇反”提供依据的典型文件。这次“镇反”导致数千个“造反”的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数十万人被捕，数百万人遭通缉、批斗、殴打、游街。一些地方如新疆、青海甚至发生军队一次就枪杀几十、几百名造反派民众的惨案。但转眼间，谭震林又被打成进行这些镇压的祸首。这次镇压也因此先后被称为反毛的“二月逆流”或反文革的“二月抗争”。但正如上述所引，谭震林的主张其实正是毛当初极力推崇的。

毛泽东的翻云覆雨到了什么程度，以下可见一斑：1968年10月14日姚文元按毛泽东旨意撰写并经毛泽东审定和强调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39〕，提出“反对复旧”，“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于是从1968年底到1969年初山东、黑龙江、湖北、四川等省及一些中央与国家机关中的造反派“新生力量”又搞出“反复旧”的新一轮造反潮。但很快毛泽东又出尔反尔，出手镇压那些闹“反复旧”的人，在闹得厉害的地方清洗了革委会中的一批“新生力量”。康生后来披露了毛泽东当时的“最高指示”曰：“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40〕何蜀先生引述这件事时谴责道：“这不是公开耍无赖吗？照此逻辑，我们可不可以说‘反走资派必出走资派，反走资派就是走资派’、‘反修必修，反修就是修’？”〔41〕

毛泽东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这条堪称经典的批示：1966年8月，林彪让秘书向毛泽东递送两份情报：太原、西安、兰州等地初起的造反派冲击机关，游行中有人“乱呼反革命口号”。毛泽东当夜便批复：“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42〕这里的“左派”指被冲击者，毛泽东对造反派说这些被冲击者是“走资派”，但在自家人那里毛泽东却称他们为“左派”，而冲击者则成了被引向陷阱的“右派”。但其实究竟谁“左”谁“右”并不打紧，关键在于无论“左”“右”其实都是他可以“牺牲”的筹码。仅从“思想史”上讲，毛泽东打击官僚可以被说成是民粹主义，他打击造反者也可以被说成是“官粹主义”，甚至他两边都打，如果要为之辩护也可以说他是无论官民都要求纯而又纯的“理想主义纯洁派”。但是，明知无辜还要拿人去“牺牲”，去做钓饵来诱人上钩，这也是“纯洁派”所该为的？今天他可以“牺牲左派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焉知明天他不会牺牲右派几十万，换取左派上百万？

（未完待续）

□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16年8月号

~~~~~

## 【史海钩沉】

### 一个不停游荡的幽灵——试论血统论对清华文革的影响

• 张 比 •

#### ◇ 前言：追根溯源

一个幽灵，血统论的幽灵，曾经长时间地游荡在中国上空，不肯离去。

血统论是一种主张以祖先长辈的血统和身份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在各个国家的封建社会和集权社会时期都存在过，从封建制度下的官员贵族世袭制即可看出。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年代，血统论这一思想被发扬到了极致，社会充满了等级制观念和阶级斗争思想。青年工人遇罗克曾撰文《出身论》对此进行驳斥，但以反革命罪被判死刑。

追溯起来，血统论由来已久。历史上，中国长期存在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为使权力和财产的继承权明确化、合法化，就有了家族中的大宗（嫡长）、小宗（庶子）之别和社会上的贵族、平民和奴隶（奴婢）之分。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魏晋、隋唐的士族与庶族，以及诛灭九族的株连制度，莫不与血统论紧密相联。中国共产党是以反帝反封建起家的，在理论上应当是与血统论划清界限的，但因其领袖人物和众多成员出身于农民，受专制主义影响较深，狭隘的“阶级立场”和在干部人事制度中贯彻的“阶级路线”，在文革中就由部分干部子弟演变成赤裸裸的血统论。血统论在1966年8月以宣扬“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达到高潮。虽然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批判（主要是因为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和群众的抵制，但始终阴魂不散，在文革运动中若隐若现，发挥着影响。本文以清华大学为例，分析血统论的酝酿、勃发、隐匿和死灰复燃的过程，以引起文革亲历者的反思，并使未曾经历过文革的后来者对文革的本质从另一个侧面上有所认识。

## 一、文革前夕：血统论由隐性到显性

### 1、“重在表现”是血统论的温和表现形式

中共从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和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就有所谓的“阶级路线”。到了夺取政权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干部人事制度中，仍然明确地提出要贯彻“阶级路线”。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接着开始的国际上的“反修”斗争，都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特别是在中苏论战中陆续发表的“九评”提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种种困惑。

此时，“阶级观点”鲜明的部分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接班人，而其他家庭出身的，如知识分子家庭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革命要求和表现，进入接班人的行列。强调出身（成分）的一方，排斥出身（成分）不好的另一方。而一些学校和其他单位也在政治运动（如四清）开始歧视后者。这种歧视自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如何理解党的“阶级路线”，就需要有权威方面的阐明。领导层中的明达之士一有机会就以宽松、温和的方式解释阶级路线。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于1961年代表党中央对北京高校毕业生讲话时说：“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弟一样，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1966年1月31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和学生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的“重在表现”政策，指出，要“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

以蒋南翔为校长兼党委书记的清华大学，正是贯彻这种温和的阶级路线的代表。在录取学生的时候，主要看考试成绩，但在保密专业录取时则有比较严格的政治审查，以录取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为主，对成绩优异、表现好的职员、资本家子弟也准予录取，但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子弟一般不予录取。在选拔学生干部和发展党员时，也基本上是这个标准。1964年到1965年，以及1966年上半年，在学生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共1000人以上）。蒋南翔更积极在教授中发展党员，除50年代早期发展的刘仙洲外，又陆续发展了张

维、梁思成等入党。这样的结果，既符合阶级路线，也团结了大多数人。但也由此种下了种种矛盾的根子，一方面，“出身不好”或一般的，仍然感到受到一定的歧视；而出身好的一部分人，却认为脱离了原教旨主义的“阶级路线”，有“投降主义”之嫌。

其实，所谓“重在表现”只是血统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温和的表现形式。因为，“重在表现”而不是“只看表现”，前提仍然是“有成分论”。并没有摒弃“阶级路线”，只不过是强调了“表现”，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可以缓解矛盾，防止出现过度的社会紧张。这种既看出身又看表现的双重标准，在实际贯彻时难以掌握，多数情况下仍会“宁左勿右”。即使是这样，在随后到来的文革中，也成为蒋南翔以至彭真、刘少奇的一条罪状。而清华大学文革过程中，和其他大学及中学里一样，更强烈的血统论者批判了“重在表现”，成为引起学生中派别分裂的重要原因。

## 2、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酝酿和组建以血统论为思想基础

文革中风行全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早在文革前，以干部子弟为主的部分学生就对学校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不满。对学校重视培养对学习成绩好的知识分子子女有强烈的意见。尽管学校对他们也做了一些照顾，但他们的愿望实际上是取消或改变原有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让他们无需经过学习和考试，而是凭借自己的“红色”身份，就可以上大学，接革命的班。据文革研究者卜伟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一文中回忆：1964年7月，他们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1965年2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而且在实际中它贯彻得还要更右一些”。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们两度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大搞阶级教育活动（如清明扫墓），均被学校拒绝。1966年5月10日，骆小海写了一篇题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的文章。5月20日，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泽东的较系统的汇报材料。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来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5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

以上他们所写的信或材料，反映的问题包括：关于突出政治问题，关于教学改革问题，关于贯彻阶级路线、“重在表现”问题。他们认为，清华附中党支部贯彻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而且根子来自清华大学。归根到底，反映了他们对温和的阶级路线的严重不满，希望以更加严厉的、纯粹的血统论取而代之。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泽东。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传达给红卫兵。毛泽东在信中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信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

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回信，等于承认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红卫兵组织政治上的合法性。于是，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以后又陆续扩大到大学和整个社会。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也就是支持红卫兵打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同时为压制“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子女提供了依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红卫兵，就成了在文革初期宣扬血统论的始作俑者。

## 二、工作组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统治期间：血统论的勃发

### 1、“反蒯斗争”中的血统论

文革初期，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委，为了自保，表面上肯定了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高干子女给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同时准备以对待1957年的右派那样来镇压反对党委的部分学生和教职工。各级党组织已经在暗查给党委贴大字报的学生、教师的出身和背景，以备“秋后算账”，但因工作组随即进校而终止。这也表明，在“阶级斗争”相对缓和时期，清华大学党委尚能坚持温和的阶级路线，而在“斗争尖锐”的情况下，也会祭起“血统论”的“法宝”。

工作组进校，立即按照严格的阶级路线，在全校及各系成立了以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主的文革领导组织。

以王光美为顾问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遭受到蒯大富等人的怀疑和反对后，掀起了一场50多天的“反蒯斗争”。蒯大富之所以敢于向工作组挑战，除了怀疑一切的精神外，也自恃贫农家庭出身，根红苗正。但工作组和他们依靠的高干子女，则以更加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纯正的背景占了上风，揭露出蒯的祖父当过土匪，蒯本人60年代初期怀疑过党的农村政策，并与苏联学生通过信，给蒯以沉重的打击。在全校揪出的700多名“蒯派”中，家庭查不出问题的斥之“背叛”无产阶级，家庭有问题的则联系其出身，加以“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对党有“阶级仇恨”的罪名，如对仅次于蒯的工程力学数学系的王某某，被查出出生于地主家庭；对工程物理系的孙某某，查出其父母都在美国，从事汽车生产技术，批判为“你的父母制造的坦克，沾满了越南人民的鲜血。”陈某某，查出其父为“四清”下台干部，让他检查思想根源，逼得他几乎自杀。

冶金系文革主任陈某某（女），工人家庭出身，预备党员，因反对工作组被撤职批判。当工作组撤离时，副组长周赤萍发现陈的父亲在东北给自己当过炊事员，是一位忠厚的老工人，忙不迭地向陈道歉，说早知如此就不会批判她了。可见周赤萍看到陈的“血统纯正”，方感到“大水冲了龙王庙”，如对方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就不会这样说了。

当周恩来奉命到清华大学调查研究，找蒯大富等人谈话时，蒯也再三强调，自己是贫农出身，父母都是1945年前入党的老党员，因此，自己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是不可能反党的。

可见，在工作组时期，无论工作组，工作组依靠的干部子女，跟着工作组批判“蒯派”的普通师生，以及“蒯派”们，都看到了家庭出身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判断自己和他人政治立场的重要依据。



## 2、“对联”的传播和辩论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宣布撤销工作组之后，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女组成了清华大学文革委员会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并于8月9日成立了以“红五类”为主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这个名词不知是何时出现的。但他们有强烈的排他性。与之相对的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后来又加上了资产阶级、走资派，称为“黑七类”。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可能加入血统高贵的“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组织的。

这时，要求批判工作组的部分学生，先是召开了“八八串联会”，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唐伟，出身革命烈士家庭，陈育延，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二人均为预备党员。家庭出身的无可挑剔，使他们敢于贴出批判王光美、王任重的大字报，而且敢于和清华大学红卫兵抗衡。“八八串联会”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参加者的家庭出身不做限制，得到的拥护者超过了清华大学红卫兵。

此时，传来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而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女谭力夫的讲话，更是使拥护这一对联的人受到鼓舞。谭力夫的讲话极有煽动性，公开批判了“重在表现”的政策，系统地阐述了血统论的观点，反映了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干部子弟的真实心态，是一篇赤裸裸的血统论的宣言书。“对联”和“讲话”很快传到了清华大学，校园里也在不同场合下开展了辩论。清华大学红卫兵和他们的拥护者，大多支持对联，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及其拥护者则反对此对联。

在关于“对联”的辩论中，部分“红五类”十分兴奋，按照历年来的“阶级路线”加以发挥，并背诵出《毛主席语录》里“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上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等语句，强迫“黑五类”承认自己是“混蛋”。大部分“黑五类”不服气但不敢公开反对，少数则不得不承认。一部分“红五类”和出身“一般”的知识分子子女，则公开反对，认为“对联”是形而上学。代表赤裸裸的血统论的对联，进一步造成了广大师生的分裂。

## 3、“8·24”事件和血统论的暂时隐匿

“对联”的出现和血统论的狂热表演，有其政治背景。此时，正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刘少奇一派政治势力开始失势。一批高干子女眼看自己的父母将要受到批判和清算，自己“血统高贵”的优势即将丧失，不得不以转移斗争目标的方式做最后的挣扎。

在社会上，他们接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口号，打人，抄家，毁坏文物，将城市里的“地富反坏”驱赶到农村，造成了短时期里的“红色恐怖”。

清华园里的“8·24”事件，则是以血统论为指导，以破“四旧”为口号，以“内外有别”为借口的一次内外联合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集中体现了部分干部子女和血统论拥护者的恐慌和残暴。

当时校园里播放着与“对联”密切相关的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战歌》，呼喊“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在二校门被毁之后，又用皮带驱赶着原清华党委领导成员

（被称为“黑帮”）搬运碎块，同时将一批中层干部和“反动权威”在校园里殴打游斗。在抄家过程中，又打死打伤了一些家属中的“地富”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

四十多年后，清华大学红卫兵成员，“8·24”事件的参加者，包括刘涛、贺鹏飞和在二校门抡皮带打人的原水利系学生马某等，均没有一个表示忏悔，只有原工程物理系学生阎淮写出了回忆文章，披露了策划和实施暴行的过程，并做了深刻的反思。

“8·24”事件后，校园里一片冷清。反对“临筹”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蒯大富等人还在集聚力量。大批人员外出串联。随着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陈伯达在《两个月工作的总结》中对血统论进行了批驳，指出，对联宣扬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主义的血统论。很快，公开宣扬血统论的偃旗息鼓。年底前，蒯大富等人组成了井冈山红卫兵夺了权，“临筹”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自动解散。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又转入了另一种形式。

### 三、团派和414派争斗期间：血统论时隐时现

#### 1、团派反血统论的局限性

1967年初，井冈山分裂为团派和414派。分裂的原因主要是权力之争，思想上的分歧包括对文革前清华是何种路线占统治地位，以及对清华大学干部的看法等。但在组织路线上，团派基本上是只看政治观点，不问家庭出身。正因如此，在文革前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好”政治上受压的，相当多数都加入了团派或支持团派。团派是靠反对坚持血统论的原清华大学红卫兵起家的，因此，在北京的大学和中学里，普遍认为团派是反对血统论的代表。

但是，由于团派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拥护且信奉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和血统论彻底划清界限。

团派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几十名委员中，自蒯大富以下，绝大部分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家庭，个别其他家庭出身的，亦有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样的安排一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根正苗红”，二也是为了不给反对派造成攻击自己的口实。团派的各系分部组成人员，也基本遵循这个原则。个别系的分部委员中有几个出身职员家庭的，被攻击为“职员内阁”，造成了相当的被动。

团派首先解放的原清华大学干部韩某某、张某某，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工农干部。

团派在组织队伍上虽然有比较大的包容性，但是以认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为标准。参加团派的“出身不好”的成员，往往表现出更左、更“革命”的特征。有些为了表明自己与“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不顾生死地参加本校和外地的武斗，有的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有些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丧失人性，对原清华大学干部严刑拷打，对划为右派的教授抄家监禁，触犯了刑律。

在对立面抓住团派“组织不纯”的把柄之后，团派领导层赶快与之切割，将教工组织“红教联”清除出井冈山兵团。

#### 2、414派继承了文革前的隐性血统论

4 1 4 派在组织上强调自己血统的纯正，公开的领导成员中都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子女。他们在攻击团派时经常揭露团派的组织不纯，如盯住团派准备“结合”的动力与农机系教授宋某某，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美军翻译”等等。

在每个系，每个班级的学生中，几乎都分裂成两派。据唐少杰教授的《一叶知秋》等文章分析，团派成员多为文革前表现“落后”，家庭出身较差或一般的；而4 1 4 派则多为“红五类”出身或一般家庭出身但政治表现好的党团员。4 1 4 派且认为，文革前清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清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可见，4 1 4 派的成员多数是文革前温和的阶级路线的受益者。

4 1 4 派是有自己的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思想路线的。吊诡的是，集中体现这一纲领和路线的《4 1 4 思潮必胜》的作者竟然是一位出身“黑五类”（反动军官）家庭的高年级学生周泉纁。这也证明，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影响之深厚，可以俘获任何家庭出身的人。

在《4 1 4 思潮必胜》中，周在分析文革中的阶级关系时说：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

在分析清华文革中的派别时，他特别指出：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他在文章中进而论述清华两派的分歧的普遍性：

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

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支造反派统一的称呼：四一四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

在文章中，他运用文革前通行的阶级斗争理论，上纲上线地将团派说成是“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和庇护地：

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

尽管414派中也有部分人并不完全同意周泉缨的观点，但《414思潮必胜》仍然被看做是414派的宣言书和纲领性文件。由于双方思想上深刻的分歧，利益诉求的巨大差距，不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且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残酷的武斗。

### 3、红教联对血统论的抗争

在清华文革中，曾经出现了一个由部分教师、职员和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红教联（后改名为红教工）。其中以教师为主体，这些教师大部分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红教联的观点倾向于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他们宣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原清华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代表了文革前在清华政治上受到排挤的教职工的非主流群体。红教联发起的第二天，就有八九十人参加，后来发展到200多人。红教联的许多成员克服了年龄偏大，子女幼小等困难，积极参加运动，并顶住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一度成为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

持有血统论观点的部分414派成员对红教联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在阶级成分上大作文章，说红教联是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占58%），神仙和神仙太太（占63%），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7%）组成的。所谓“神仙”，就是1960年代初，由党委组织的党外知识分子座谈会（被称为“神仙会”）的参加者。文革中则带有贬义，接近“牛鬼蛇神大杂烩”的意思了。据文革后的统计，此说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参加红教联的教授、副教授等，都是热爱祖国、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文革前和后来都做出过突出贡献。所谓“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则完全是子虚乌有。

由于414派的反复攻击，加上红教联在为精神病患者陈里宁翻案等问题上中犯了错误，成立了仅139天的红教联被迫解散。但解散以后，正式成立后的414派攻击团派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最脆弱、最有辫子可抓、最不堪一击的红教联，集中打击的就是红教联的负责人陶德坚。1967年5月10日，在主楼操场揪斗了陶德坚，罪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是共产党员，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因同情右派分子，受过党内处分）。此后，红教联其他成员有些也遭到批斗或绑架。

尽管红教联在成立46天后因吸收了不少工人成员（其中有些是优秀的工人技师），改名为红教工，但414派紧紧抓住红教联，丝毫不触及红教工。414的一把手就说过，抓住“红教联”猛打，绝对不许触及“红教工”。这也反映了在血统论的影响下，抓住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红教联，可获得舆论上的优势。

## 四、工宣队统治时期：血统论变本加厉

### 1、毕业分配中的“阶级路线”

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如同1966年6月进校的工作组一样，掌握了学校的大权。在此时期，名义上不说，而实际上在做的，就是让血统论死灰复燃，成为治理学校，镇压反对者，贯彻极左路线的重要武器。对应于1966到1970年毕业的毕业生的分配，就明显有这一特点。

与文革前贯彻温和阶级路线时的毕业分配不同，由工宣队领导的分配小组（也有教师参加），严格按照家庭出身的标准来分配毕业生的去向。他们把全校的专业打乱，既不按照专业对口，也不按照学习成绩和学生的家庭地点，而是完全按照家庭出身的“好坏”来分配。

这样，有6届（70届有两届）毕业生，共1万余名毕业生，被以“四个面向”，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赶出校门，其中大多数专业不对口，到了县以下偏远或艰苦地区。

以工程物理系（机要系）为例，这个以原子物理有关专业为特点的系，毕业生的去向本应是到二机部、国防科委和有关高校、科研单位。文革前的1958—1965年，共有998名毕业生，100%到了专业对口单位，仅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就有603名，占了60%以上。而1966—1970届毕业生，也是998名，分配到专业对口单位的仅占40%，60%的都被分配到地方企业或农场、农村。其中，1966届因分配方案是早已决定的，近80%仍然专业对口，扣除这个因素，1968、1969届毕业生分配时专业对口的甚至不到20%，多数毕业生都是拿着其他系其他专业的分配方案被分配的，美其名曰全校统筹，贯彻阶级路线，调剂分配。而其他非机要系与“机要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毕业生，则可因家庭出身“红五类”而占用了机要系的分配名额。

在被胡乱分配到地方厂矿和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毕业生中，有不少是原来学习成绩优异的尖子学生，其中有的在县以下企业当工人，有的在商店当售货员，有的在农村当民办教师，一直到1978年，荒废了10年的大好光阴。更有少数毕业生受到极左势力的迫害，被迫自杀，或精神失常。

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宣扬过血统论的部分干部子弟，此时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成了“黑七类”，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头衔，多数也被分配到偏远艰苦地区接受“再教育”，成了死灰复燃的血统论的受害者。

## 2、从清理阶级队伍到“清查”运动

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宣队在清华盘踞8年（1968—1976），他们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抓516运动，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后果之严重，超过了文革前2年的任何一个阶段。

从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76年10月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宣队以持续不断的清查和迫害来维系它的统治。整个文革期间，全校1228人被立案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58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由工宣队立案审查者达到1120人，约占教职工总人数20%；被专政者达到167人，1968年底至1970年非正常死亡（被逼自杀）的人数急剧增多，已逾20人。他们通过大大小小10余次政治运动给清华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套上了一道又一道政治枷锁。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三个月运动”和1976年针对天安门事件的清查运动。

据陶德坚在《风雨人生》一书中的回忆，农场撤回北京后，在一次大会上，迟群宣布清华大学清查516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胜利结束，并宣布给陶德坚戴上“516反革命分子”帽子（清华大学唯一定案的“516分子”）。

## 3、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对清华知识分子的“再教育”，除由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担任校级、系级及基层领导岗位外，用批判会、学习班等形式在校内进行教育改造外，还长时间地组织他们到北京及附近的工厂农村劳动，以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竟然不顾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在血吸虫泛滥的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强迫大批教师、职员去进行艰苦的劳动。

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关于鲤鱼洲，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工宣队宣布建立鲤鱼洲农场。五月初，首批三百九十八人去鲤鱼洲。先后有三千多名教职工和家属被送鲤鱼洲农场劳动。农场有农田九千三百亩，原为劳改农场。教工及家属们农忙季节每天要在烈日下强体力劳动十多个小时。地处血吸虫重疫区，致使大批人染上血吸虫病。当年已确诊七百四十七人，怀疑待查者一百一十一人（迟群在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情况时，将人数分别改为二百四十九人和八十五人。——原注）。然而，因血吸虫病而死亡、致残、全休或半休的人数，则还没有透露。

迟群、谢静宜之流，炮制了“两个基本估计”，即文革前的各级学校里基本上贯彻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广大教师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前一条基本估计，被他们用来打击迫害原清华领导干部，后一条则是一种新的“血统论”，成了广大教师头上的“紧箍咒”。

◇ 后语：幽灵还在飘荡

（1）血统论在文革中以“对联”的形式出现，反映了部分干部子女以血统作为资本，占据社会资源的愿望。而一旦他们即将失去这一资本，就表现为疯狂的争夺和对弱势群体的残酷镇压。血统论来源于封建宗法社会，是统治阶级垄断政治地位，占有社会财富的理论依据。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取得社会地位和合法报酬，而不分血统的“高贵”与“低贱”。因此，各种形式的血统论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鼓吹血统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与社会和其他高校一样，清华大学在文革前多次政治运动中压制和打击了一批人，也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家庭出身为“红五类”或出身于其他家庭但“听话，出活”的人，已经形成了历史的恩怨。在温和的“阶级路线”之下，尚未出现严重的对抗。在文革中，在失去了党和行政控制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引导之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争夺权力，因而发生了激烈的争斗，最后出现了残酷的武斗。

（3）清华大学的两派（团派和414派）中的多数成员都曾经是鼓吹赤裸裸的血统论的原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受害者，但都没有从理论上真正认清血统论的危害。他们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采取了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指责对方的队伍混进了“阶级敌人”，有“黑后台”。其中，尤以414派的纲领性文件《414思潮必胜》，系统地阐述了文革前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的政治主张，反映了血统论对这一群体的毒害之深。而由部分教职工组成的红教联虽对血统论有所抵制和抗争，但由于自身的弱点，在414派的打压下又遭到团派的抛弃，只能归于失败。

（4）在工宣队进校后的8年里，血统论死灰复燃。迟群、谢静宜之流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迫害，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造成的后果之严重，超过了文革前2年。清华大学工宣队是由毛泽东亲自派出，并直接控制的，迟谢之流总结出的“六厂二校”经验得到毛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不论是推行温和的血统论，一度批判血统论，还是让血统论死灰复燃，用极端的血统论残酷迫害知识分子，都在毛的掌控之中。

（5）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胡耀邦等有良知的共产党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很大程度上是对血统论的否定。人数众多的“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弟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血统论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彻底清算。部

分被平反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仍然有严重的特权思想。80年代初，原清华自动控制系学生陈某企图挤占其他学生的名额出国留学，被抵制后，竟然说“我们的父母出生入死打下了天下，竟然连出国留学都不行”。第二年他仍然用其他单位的指标出了国。而抵制他搞特权的清华党委副书记则遭到了打击报复。陈某之父（中共元老）在主管组织人事工作，培养“第三梯队”时提出“还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子弟可靠，他们总不会挖我们的祖坟”，充分表露了某些高层领导人中血统论思想的根深蒂固。而许多“红二代”在走上高位或掌握经济资源后，则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疯狂地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批“红二代”凭借“血统高贵”，在青少年时代多表现出政治上的狂妄性，而在中老年时代则更多地表现出经济上的贪婪性。

（6）在《心灵史》（改定版）的前言中，当年“红卫兵”名称的倡议者张承志认为，若说（60年代）那场革命有什么罪恶——那么以血统的借口对他人实行歧视的行为，是文化革命中的最大罪恶。文革中尖锐批判血统论的是青年工人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至今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清华两派虽然都反对过极端的血统论，可是始终没有真正与血统论划清界限。文革结束后许多作者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个话题，写出一些文章，但认识水平尚没有一篇能够超过《出身论》的高度。近年来，在薄熙来大唱红歌，为部分“红二代”接班大造舆论的喧嚣中，隐约又可看到血统论的阴魂在游荡。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批判血统论，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卜伟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i/yc\\_i\\_027.htm](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i/yc_i_027.htm)
- （2）谭力夫：“从对联谈起”。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3）阎淮：“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载《历史拒绝遗忘》，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2
- （4）周泉纁：“414思潮必胜”。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5）陶德坚：“风雨人生”。载五柳村网站。
- （6）林贤光：“我和清华‘红教联’”。载《历史拒绝遗忘》，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2
- （7）唐少杰：“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www.shz100.com](http://www.shz100.com)
- （8）张承志：《心灵史》（改定版）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张比（1945—），北京人，1968年1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曾任高校学报副主编，编审。2008年退休后从事文革历史研究。）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